



往事钩沉

方仲平

## 隐蔽战线上的斗争

我的岳母刘惠1917年8月22日生于洪洞县苏堡村,岳父段云章1917年2月2日生于洪洞县,他们俩很早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由于他们的住所处于县城繁华地段,地理位置好,视野开阔,便于突发事件的处置,党组织决定把洪洞县交通站建在那里,主要从事情报传递以及人员转送等工作。为方便工作,经党组织批准,岳父岳母走到了一起,结为伉俪。

抗日战争时期,有一次,几个地下党员正在交通站开会,突见日本鬼子冲入县城到处抓人。小日本鬼子骑着高头大马,从三面围堵过来。为躲避敌人追捕,部分群众撤退到县城外同敌人周旋,但苦于寡不敌众,几个地下党员和群众受伤被俘或牺牲。岳父岳母因熟悉地形侥幸逃脱,此后,单线联系的交通员就像断了线的风筝,失去了联系,无从寻觅。刚刚建立起不久的交通站也无法开展工作。

自从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,岳父岳母一直

在千方百计寻找组织,党组织也想方设法恢复与交通站的联系。他们的大女儿作为我党秘密交通站里的小小交通员,将需要传递的情报缝到棉袄里传递到下一个交通站,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那时,岳父岳母不敢随意搬家,就怕接头的上线来了找不到。经过不懈地努力,地下交通联络站终于与上级接上了头,开始恢复工作。

1950年,公安局在清理敌特档案时发现,军统山西工作站站长田俊已经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,因担心田俊可能会搞破坏活动,随即决定对刚搬到北京的田俊之妻白玉莲进行监视。岳父岳母接受了这个任务。他们伪装成商人出入各种场合,接近被监视对象,收集情报。

1952年,岳父岳母的任务顺利完成了。公安部的同志询问岳父岳母是否愿意留在北京工作,但最终他们还是携全家回到了太原。孩子中的老大已经年满16周岁,自己选择留在北京工作。岳父被安排在省政府工作,岳母被安排在省安全厅的一个工作站,三个孩子分别被安排上小学和幼儿园。

如今,我的岳父岳母已经去世十多年了,他们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,还给我们留下了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和红色基因。

###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

乡土记忆

## 帮工的故事

郑天佑

过去在农村,不管是谁家起房盖屋、打土墙,村里的人们总是带着工具积极参加,不计报酬。如果不去帮一下工,自己就觉得失礼。就这样,你三天他两天,主家只管饭不付工费,花不了多少钱要搞的土建工程就竣工了。这种帮工的方式在农村是一种团结友爱、相互帮助、邻里和睦的习俗。

上世纪60年代,我是一名农村小学教员,每逢社员家里搞土建工程,我也要带着工具去帮工。那时教员在村里称先生,很受人尊敬。我去帮工,主家不让我做重活,我只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,端茶倒水,当个跑堂的角儿,借此机会给社员们讲些新鲜事,给帮工的伙计们鼓干劲。有时人员不足,我也争先上场和泥、铲土,出一身汗增进感情,大家高兴,主家满意,我也尽心了。在那个小山村我留下了“咱村这先生没架子,是个好后生”的美誉。后来,我在这个村摘取了一朵最美村花,幸福一生。

1973年的秋天,阴雨连绵,土地湿润,正是打土墙的好季节,当时我调到水泥厂上班,与工友们说起家中打墙之事,厂长李海金全力支持,磨工组组长张金印、修理组李富棠利用倒班时间召集20多名工友到我家帮工。那些工友们都是来自当地农村的小伙子,都有打土墙的技术,20多个工友分两班,8尺高的7堵土墙计划一天

完成。张金印是打夯老把式,一开场他就领着一班人高声喊起打夯号子:“工友们呀!用力夯呀!(众)嗨呀嗨——夯呀!”李富棠组不落后:“伙计们呀!用力夯呀!(众)嗨呀嗨——夯呀!老东家呀!快上茶呀!(众)加香烟呀!夯呀!”一时间打夯号子声响彻小山村。村人邻里闻声也纷纷赶来帮工,因人多插不上手,村叔王来富、赵福计这两位打墙老把式一看这阵势,便带领十几个社员把村里的打墙椽杆工具借来,另组一班人在东面再打一堵丈二高的土墙。这下可红火热闹了,大院里一时充满了欢乐、充满了友爱。三班人马挑战,一天的任务半天完成。由于人数的增加,后勤供应不足,幸好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妻子,筹借票证及时购回烟酒副食,从供销社饭店买回馒头,本家女人们一齐来帮忙,七手八脚备足一顿比较丰盛的午餐。炒了一大锅猪肉粉条豆腐白菜土豆大杂烩菜,熬制了一盆鸡蛋海带打卤浇汤。高粱面压河捞,二面馒头主食,散白酒满足供给。午时到,三班人员围坐在院中大槐树下谈天说地,边乐边吃,猜拳敬酒,汇聚成一派团结友爱的浓厚氛围。

半个世纪过去,每当想起当年帮工的故事,我的思绪一下就回到了50年前,思忆那时人与人之间难以忘怀的感情。

古城旧事

## 父亲的节日

王苏

4月24日这一天是父亲的节日。每年的这一天,他都要把我们叫回家,给我们讲1949年4月24日他进太原的故事,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听他讲过N遍的故事。但是我们都没有嫌他烦,他依然讲得眉飞色舞,津津有味。

父亲生于1920年,1938年,18岁的他从中学肄业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抗日,后来进入冀南银行,在寿阳县工作。

1949年4月24日,父亲所在单位冀南银行跟着解放军进入太原市,接管阎锡山的伪山西省银行。此后,尤其是离休以后,每逢太原解放纪念日,他总会和老战友、老同事聚一聚。

后来,他和老同事的聚会越来越困难,不少人走了,便改为和我们聚会,并且郑重宣布:“此后每年4月24日我们家聚会,这是我的节日。”

这一天,我们大家聚在他老人家身边听他讲踏着硝烟进太原的情景,讲他进城看到的景

象。他们奉命冲进鼓楼街阎锡山伪银行,他们亲手摘下“山西省银行”的牌子,当日,马不停蹄,不知疲倦,打扫、收拾、整理。为了建设人民新银行,他们兴奋异常,干劲十足……

一说到4月24日,父亲就滔滔不绝,情不自禁,甚至像小孩子手舞足蹈起来。他说,1949年4月24日,太原城回到人民手中,太原新生了,人民银行新生了。这一天值得庆祝。

父亲常把解放前后做对比,常讲在根据地银行的故事。

有一次,我追问冀南银行的事,父亲流露出自豪的神色,说那时候条件很艰苦,比如运送钞票用的是牲口。说到他独自一人赶着一匹骡子往某地送钞票,在一段山路上遇到两个劫匪,他临危不惧,举枪警告无效,只好鸣枪,这才吓退劫匪,顺利完成了任务。

父亲在银行工作了一辈子,他认真负责,两袖清风,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难忘时刻

## 涉水过河逛古城

春潮

太原古县城经过多年的修复,最近对外开放。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进入古县城,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文庙门前。看着整修一新的文庙,不由地就想起了60多年前我和同学们一起涉水逛古城的趣事。

1964年我小学毕业后,同学们开始到考上的中学继续学业。当年不像现在就是就近入学,我们身处市中心的小学毕业生,也有被分配到远郊的学校就读,我们班就有一个Z同学被分配到了地处晋源镇(太原古县城)的太原二中上学。1968年夏季,各校开始复课,由于各个中学开课的时间不尽相同,于是在Z同学准备去学校报到时,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就自告奋勇地要陪他一起去。说是陪同学去报到,实际上是想去看看古城的风貌。

我们的家都住在汾河东岸,太原二中在汾河西边。要陪同学去二中报到,穿越汾河就是必须的。当年汾河上只有迎泽大桥可以过河,为了节省时间,我们决定走近路,从汾河上涉水过河。我们三四个人一大早就骑自行车,沿着汾河东岸的简易公路一路向南走去,走到大约小店村时,看到许多人都从这里涉水过河,我们也跟着人群,扛起自行车开始渡河。当时汾河水并不很深,只能淹到小腿肚上。我们过河后,擦干腿上的泥水,穿好鞋袜,骑上车子直奔晋源。

到了晋源,看到设在古庙中的太原二中,我们几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同学,都感到既神秘又新奇。在Z同学的带领下,从前院的校舍一直看到后院的大殿,那些高大的殿堂、粗壮的古柏,还有那被称作状元桥的石桥,都让我们浮想联翩,想象着在这古庙中求学时会发生哪些故事。不知不觉已到中午时分,Z同学这时也办完了报到手续。我们都坐下来休息,掏出随身带的干粮,就着Z同学给我们找来的开水,填饱肚子,然后开始返程回家,回程依然是抄近道涉水过河,大约在下午四五点时,安全回到各自家中。

这一趟过河逛古城的经历,是我第一次骑车走了几十里路,第一次独立外出,第一次涉水过河,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
岁月留痕

## 一把算盘

易建设

在家中书柜的顶端,静静地摆着一把栗木做的老式算盘。这把13档的算盘跟随我已经56年了。

1965年9月份,开学我就要读小学四年级了。那时候,小学四年级开始开设珠算课。家里正准备给我买一把算盘,姑姑知道后说,她们家有一把,可以送给我用。那把算盘到我手上时,已经有点历史了。由于长期使用,珠子已磨得光可照人。原来,它是我姑父当学徒时家里给他买的。上世纪50年代初,姑父在供销社参加了工作,单位有算盘,这把算盘就闲置在家里了。姑父是打算盘的高手,在供销社工作,一天到晚手不离算盘,他的算盘技术熟练到左右手同时操作。他鼓励我好好学习,把珠算练精。我拿到算盘,高兴得爱不释手。在同学中我的算盘是最好的,不仅仅光亮好看,还有13档,是最大的。我的同桌因家里比较困难,没有给他买算盘,有时候借邻居家的来上课,多半时间是与共用一把算盘,算盘放在课桌中间,一人用一头,两人勉强也够用。就这样,这把算盘一直陪我到小学毕业。

1973年1月,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劳动,偶尔也会拿出算盘来给家里算算工分什么的。直到1976年春天,我当上了大队会计和信用社会计,大队本来配备了算盘,可我觉得没有我自己的好用。我自己的算盘用顺手了,于是这把算盘便成了我的贴身工具,多少个日日夜夜陪伴在我左右。靠这把算盘,把大队的预算、决算,社员的存款、取款等工作做得仔细、精准,得到社员们的认可与上级部门的肯定。

1977年10月,高考制度恢复,我积极报名参加考试,还真考上了师范学校。1978年4月,要去学校报到了,我告诉我妈,帮我把这把算盘收好,也许今后还会有用的。我妈认真地用一块布包好,放在了衣柜里面。

1980年4月,我从师范学校毕业,分配到县一中工作。这年高考结束后,学校领导通知我暑假加班,参加省招生办的高考统分工作。我一看文字通知,工作人员除了需自带行李外,还要带一把算盘。因为那时候计算器还稀有,统分要用算盘汇总。当时,我一下乐了,我老家不是正好还有一把算盘吗?我赶忙回到老家。我妈从橱柜里把算盘给我拿了出来,它用布包裹着,还是那样一尘不染,一样油光晶亮。后来,这把算盘随我连续4年参加省招生办的高考统分,全县几千名高考生的各科成绩就是我用这一把算盘一题一题、一分一分统计出来的。

这以后,尽管时光流转,岁月更迭,我也多次搬家,丢了许多难以割舍的东西,可这把算盘再也没有离开过我。当然,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,计算器已普及到社会每一个层面,算盘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。可这把已经陪了我56年的算盘,将会陪伴我终生。

